



中国抗日
战争史丛书

北京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抗战时期的 文化教育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抗战时期的 文化教育

抗战时期的 文化教育

主编 戴知贤 李良志

北京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京)新登字 2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戴知贤、李良志主编。—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5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

ISBN 7-200-02702-2

I. 抗… II. ①戴… ②李… III. 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国

IV. K26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4878 号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

KANGZHAN SHIQI DE WENHUA JIAOYU

主编 戴知贤 李良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875 印张 370000 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00-02702-2/k·283

定 价:16.70 元

24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刘大年

执行主任:白介夫

委 员:(按姓氏笔画)

丁守和	马齐彬	王 洪
王庆成	王桢林	刘建业
齐世荣	齐密云	李 侃
李世凯	李良志	何 理
吴坤定	杨 策	肖一平
张注洪	张宪文	张海鹏
张承钧	金冲及	罗焕章
温贤美	戴 逸	

总 序

刘大年

中国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一起,今年正逢 50 周年。50 年前的 1945 年,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值得隆重纪念。中国学术界出版了和正在出版一系列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来纪念那个历史上的峥嵘岁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是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它的水平未必尽能让读者满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是学术界为推动抗日战争研究,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所作的一次努力。

人们认识历史有和旅行者观览名山大岳相像的地方。旅行者在山间辛苦跋涉,沿途奇峰陡壁,茂树丰泉,天险胜地,历历在目;但往往要走出山脚以后回头望去,方能见出它的逶迤势态,灵气所在。抗日战争结束 50 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回头来认识那段转换祖国命运的历史,显然要比以往的认识深刻许多,丰富许多。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改变了

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又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是基本条件之一。这个基本条件的作用贯穿在抗战的全过程里。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就无从实现，蒋介石就只会走“攘外必先安内”的道路走下去；或者全民族抗战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中国能否取得胜利，那是一个大问号。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结局，就会充分明了这一点。从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相结合这方面看，人民力量兴起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更加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民族战争与人民战争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区别的一面。民族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支配全局的矛盾。武装到牙齿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情况一天存在，这个主要矛盾就要一天存在。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民族不独立；第二，社会未能工业化、近代化。它们一起把中国拖进了濒临灭亡的境地。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这个根本转折，一是近百年间，中国抵抗外国侵略的战争无不遭受失败，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二是八年抗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抗日战争中，军事上与国内政治关系上同时并存着两个过程，两种演变。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日本的力量由强变弱，由军事胜利推进到最后彻底失败；又一个过程、一种演变，是国内两大政治势力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朝相反方向行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起来。这两个过程、两种演变紧密相连。前一个

演变关系中国亡不亡国、民族能否独立的问题；后一个演变关系今后将是新中国还是旧中国、中国能否打开走向近代化前途的问题。谁在抗日战争中最出力，谁就在抗战以后更有力量，更有发言权，或者左右战后中国。抗战胜利准备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决战。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人民解放战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随之诞生，不久，中国并踏上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的道路。归根到底就是由抗日战争这个历史的转折，这个力量准备所造成的。新中国代替旧中国，第一，中华民族巍然独立了；第二，国家近代化的前途畅通了。中国于是开始了自己的复兴。用一句话来说：中国复兴枢纽——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八年，这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大规模战争，中国近代有多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抗日战争这样的规模、性质、结局的战争确实为洪荒所未有。是哪个力量决定中国抗日战争胜利，铸造出中国复兴枢纽的？那就是我们全民族的奋起，就是以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力量满负荷的发挥，砥柱中流。抗战八年的前四年，中国是单独对日作战的。其时苏美两大国都没有卷进到战争里面。英美与日本有矛盾，也有准备与日本妥协，牺牲中国的举动。苏联同情中国，但担心日本北进，苏德战前，苏联与日本订有为期五年的苏日中立条约。与日本全力抗衡的，这时举世唯有中国。1941年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与英美结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由此不再单独对日作战，而是与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于是就变成了在盟国支持、协同下，共同对日胜利的结局。这是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规定的。不但中国抗战的面貌顿然刷新，世界的面貌也一下子刷新了。然而这并非中国抗战取胜的特点，而是反法西斯各国取胜的共同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是一个整体，最后一败俱败，一胜俱胜。同盟国间的支持是相互的，双向的。

而非某种单行道。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有中国这个主要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的胜利。中国抗击的日本兵力最多。按日军师团编制计算，“七七”事变到1945年，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关内战场上的陆军，最多的年份占编制总额90%，最少的一年占35%，八年中平均每年占76.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主力仍分布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数目最大。“九·一八”至“八·一五”期间，日军出国作战共伤病战死287.4万人。其中89万余人死于太平洋战争，多达198.4万人是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中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死亡2000余万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整个二次大战中，英国武装部队、本土加殖民地人民共死亡80万几千人，美国海陆空军死亡共32万余人，其中仅一部分是牺牲于对日作战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其武装力量、边防军和内卫部队共牺牲866.84万人，死于对日作战的也只有3万余人。中国抗日连续八年，前期苏联援华物资约1.7亿美元，后期美国援外物资共460亿美元，援助中国的不过6.3亿美元，不足七十分之一。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抗日作战到底的。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来自与同盟国共同对日作战，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地位。苏联红军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决定性力量，仍然需要有美英联军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军是太平洋上打败日本的决定性力量，一直攻占了日本冲绳岛，仍需有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粉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谁也不能因此认为苏联英美并非单独对德对日作战取胜的，其历史重要性就减少了，地位就改变了。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作战中的地位，正像欧洲战场上的苏联，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那样。抗战期间流行一句话：兵民乃胜利之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中国人民力量兴起壮大，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之本。中国由衰败向复兴转换，就是靠的这个本。

自从新中国迈上征途的第一天起,中国复兴的鸿篇巨制联绵不绝于书,尽管其间也有挫折和失败。现在,抗日战争过去了 50 年,中国人民正旅行在一座新的大山上。这座大山高耸霄汉,它不叫别的什么,叫做中国的现代化。和一切历史性的旅程一样,人们在当前这个旅程中,不可能一路尽是春日载阳,百花齐放,群莺纷飞,也难以避免要经历悬崖栈道、崎岖羊肠,或者碰上寒冬腊月,大雪狂舞。增进对抗日战争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爱国精神传统的认识,增进对中国人民敢于反抗强敌、顶天立地气概的认识,也必将增进人们对现代化旅程胜利前途和应当如何有所作为的认识。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历史总会这样那样作用于现实,无论现在、将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珍惜这个光荣,发扬这个光荣。

就像历史本身永无穷期一样,人们认识历史至少一些方面也无穷期,以至终究要遗留下难以弥补的缺陷。这只会促使有志者去勇于探索、发现真理,而不会裹足不前。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毕竟有所前进了,那场伟大的战争改变了中国,也参与改变了世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谨请以这部《丛书》献给所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人、爱国者、战士和所有先烈。

1995 年 2 月 11 日

前言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性。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说，在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有各种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这两段话，把文化战线在革命事业的重要地位作了高度的概括。抗日战争的全部实践也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抗日文化运动为唤起民众、团结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争取抗战的胜利，发挥了强有力的“武器”的作用。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从“五四”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经历了18年。同这18年相比，抗日战

争时期的文化运动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一、“救亡”成了全民族的中心主题。在救亡的旗帜下，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收复失地，赶走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这是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一切文化运动都是为了抗日救亡。正如当时的歌曲所唱的：“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走出城市，走出机关学校，走向前线，走向农村，改变了往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方式；由于国破家亡，许多文化人与广大民众一道，背井离乡，过着流亡的生活，备尝艰辛。客观现实使得抗日文化运动和抗日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相结合，使得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同时，许多文艺工作者亲身体验了战争的生活实际，耳闻目睹无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事迹，开拓了创作领域，充实和丰富了创作内容。

二、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改变了过去对进步文化的“围剿”政策，实行了某些民主、开放的措施，出现了一种比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一批在30年代被追捕、受迫害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的进步文化人，有了一定的公开活动的余地。国共合作关系建立后，一批文化人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获得了自由（如田汉、阳翰笙、潘梓年、许涤新、救国会“七君子”等）。大量抗日报刊的创办，使进步的抗日言论有了自由发表的园地。

当然，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不仅要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奴化思想、奴化政策作斗争，还要同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对日妥协、搞反共磨擦、压迫进步文化事业的反动思想和活动作斗争。

三、文化运动的地域非常广阔，大体上分为三类地区：一是以武汉和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包括桂林、昆明、成都等整个“大后方”；二是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三是广大沦陷区，其中特别是沦陷后的上海，一批爱国文化人在外国人的“租界”里坚持抗日文化运动，称为“孤岛”文化。

上述三类地区的抗日文化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有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和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直接领导。以武汉和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文化运动是在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开展的。在抗战前期，国民党参与了“文化抗战”的领导；但实际上共产党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和全国“文协”等抗战文化团体中，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当局执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政策，对抗日文化运动已经不再是起领导和促进作用，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限制，起着阻碍的作用。至于上海“孤岛”文化运动，基本上一直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坚持和发展的。

四、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与之同步的，毛泽东文化思想，党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也逐渐充实和完善起来。1940年1月，延安创办了《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章精辟地论述了中国文化革命的特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1942年延安文艺界整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革命文艺、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指导方针。

抗战中期和后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抗战初期，因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文化人撤离大中城市，退到大后方，颠沛流离，无法

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作品的创作，文艺以诗歌、短剧（街头剧、活报剧）、报告文学、通讯报道为主。中期以后，一方面是抗战处于相持阶段，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抗日的积极性减弱，而反共磨擦日益频繁，取缔进步文化运动，广大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中共南方局指导下，转入学术研究和创作活动，硕果累累。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中的一本。本书共13章，其内容基本上覆盖了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范围的文化运动。除了“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外，本书特地增加了关于上海“孤岛”文化、战时进步文化人在香港、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抗日斗争等专文。文化和教育两者密切相关。“文教事业”，在我国历来是相提并论的。本书着重写“抗日文化运动”，同时也兼及战时大后方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

但本书也有不足之处，一些应该反映的问题未能得到反映；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四五年间文化教育界的救亡活动，缺了一个专题；战时大后方和敌占区的中小学教育也无专文论述；抗战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没有得到反映。

当然，从“九·一八”到“一二·九”，即救亡运动初起之时，中国知识界的觉醒，文化界的崛起，这些情况在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化运动史中多有记载，本文虽未列专文论述，读者仍可以从现代史中获得这段历史的有关情况。然而自1937年至1945年的8年抗战期间，记叙大后方和敌占区的中小学教育情况的著述却不多见。抗战期间，国土沦陷，敌机狂轰乱炸，中国教育机关备受摧残。由于国民政府中有识之士深知教育乃百年大计，不能因抗战而中断；由于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大部分大专院校（教师、学生、设备、档案）被迁至大后方，重续弦歌。停办的中等学校的部分师生由教育部门接送

至内地，设校安置；留在敌占区的中学也尽可能迁至安全地带或转入地下，坚持办学。8年战乱，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培养，都做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一书对此未予反映，自然是一个缺陷。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停滞了，但中国和苏联的文化交往始终没有中断。两国文化组织、文艺界人士互通信函，传达信息，互相声援，或讨论艺术方面的问题；中国文化界举行茶话会、晚会、纪念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著名文化人（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的逝世；中苏互相在对方国家举办文化艺术展览；中苏友好协会的会刊《中苏文化》在抗战期间刊载了大量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报道了大量苏联文艺活动的消息；1941年8月22日起，上海俄文《时代》周刊出版中文《时代》周刊，1942年成立时代出版社，成为在上海租界内展示苏联文化的特殊橱窗；同时增出《苏联文艺》月刊。所有这些，都是中苏文化交流的成果，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此外，与其他国家也有某些文化交流。本书的上述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有待于再版时予以弥补。

本书13章分别由14位作者执笔撰写。各章的撰写人是：第一章杨克文，第二章朱莉涛，第三章清庆瑞、李良志（由李良志提供初稿和部分资料，由清庆瑞撰写），第四章温贤美，第五章李仲明、刘丽，第六章清庆瑞、李良志（由李良志提供初稿和部分资料，由清庆瑞撰写），第七章李明圣，第八章戴知贤（1—3节）、宋金寿（4—7节）、李劲松（8—9节），第九章原良志，第十章戴知贤，第十一章杨德山，第十二章、十三章周大计。14位作者中，有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教授，有专门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中年史学专家，有即将毕业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专业史学工作者、年轻教师和硕士生，老中青相结合，扬长避短，相得益彰。但因成书仓促，难免有疏漏之处，望方家不吝赐教。

戴知贤

1994年7月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一二·九”运动与抗日文化运动	(1)
一、在民族危亡关头觉醒的知识界	(1)
二、南下播撒抗日救亡的火种	(8)
三、进步文艺界的“两个口号”之争	(15)
四、“七君子”入狱和文化界的抗争	(22)
五、关于“新启蒙运动”	(29)
第二章 卢沟桥的炮声，文化界的怒吼	(34)
一、全国文化界奋起救亡	(34)
二、上海文化界同仇敌忾	(44)
三、创办救亡报刊	(51)
四、慰劳抗敌将士	(56)
五、救亡怒涛响彻江汉之滨	(62)
第三章 盛极一时的武汉抗日文化运动	(67)
一、风云际会，文化荟萃	(68)
二、团结抗战的号角——《新华日报》	(70)
三、抗日文化运动的战斗堡垒——“第三厅”	(78)
四、盛大的抗日宣传周和献金运动	(82)
五、文艺界团结抗战的旗帜——“文协”	(87)
六、蓬勃兴起的抗战文艺	(94)
第四章 重庆——大后方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	(107)